

编者按

20世纪50年代初，八千多名湘女踏上援疆之路，有力地推动了新疆建设发展，促进了民族团结进步，史称“八千湘女上天山”。如今，当年风华正茂的八千湘女，很多已不在人世，其余的也都是耄耋老人。在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，我们启动八千湘女口述历史项目，真实记录“八千湘女”人生故事，再现她们忠诚报国的大爱情怀、敢于担当的顽强意志、甘于奉献的崇高境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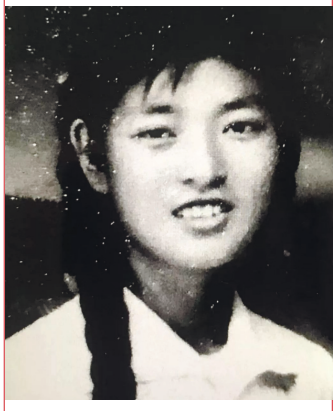


扫一扫，
看八千湘女
的精彩人生。

我是“棉花姑娘”，王震将军吃过我烧糊的米饭

口述 / 刘玲玲 文 / 李立

湘女档案



刘玲玲，1938年生，湖南长沙人，1952年入疆，进入八一农学院学习农业生产技术，因掌握植棉栽培技术，被大家称为“棉花姑娘”。1988年被评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军区拥军优属先进个人，1992年被国家民政部授予“先进工作者”称号。现居石河子。

“生在洞庭湘江边，壮志凌云到边关。且守边疆且屯田，新疆旧貌换新颜。立下愚公移山志，戈壁沙漠变江南。莫惧屯垦一代终，后人济济满天山。”

这是我自己写的一首诗。对于当年的八千湘女来说，“献了青春献终身，献了终身献子孙”，是不少人一生的真实写照。

骗母亲去湖北参军，三年就回

1952年报名参军时，正在长沙岳麓中学读初二的我刚满14岁。那会儿，我在学校文工队慰问过抗美援朝伤残军人，听了他们的故事后，就一心想参军。

看到了新疆招聘团在长沙的招兵告示，我坐不住了。尽管当时我已经考上湖南湘雅医院护士班，但立刻决定不上了。为了去参军，我骗母亲“是去湖北参军，三年以后就回家”。

然而，由于年龄小，我去报名的时候，招兵团通不过。于是，我找居委会开了个证明：16岁。可是，小小的个儿，一张娃娃脸，怎么看我也不像16岁。

“你去新疆能干什么呢？”
“我可以去兵团的文工团！”
我马上唱了首歌，并即兴跳了支舞。第二天，看到报名公示上有了我的名字，我高兴得不得了。

就这样，我与潇湘烟雨中的长沙告别，走进了大漠风沙。

在西安，进疆女兵们休整了一个月。那是一段最快乐的日子。

数百女兵在革命公园里学习打腰鼓、扭秧歌，接受军队队列训练。很多湖南女兵第一次看见白面做成的馒头，那么大，我们以为里面裹了糖，就一点一点慢慢地吃，满心希望能够吃到糖，但最后发现没有。第二次，我们就不肯吃馒头了。

我们对新疆一无所知，只好沿途四处搜集关于新疆的信息。一位修鞋的老人看见我们背上的雨鞋哑然失笑，说新疆都是沙漠，少有雨水，风沙来了，人都要躲到骆驼的肚子下面。

此后，我们就开始了一趟耗时2个月的西行。这趟西行艰难而凶险，亦是漫漫长途。当时河西走廊一带土匪成群，我们一过兰州，西北军区就专门派了一个全副武装的连队护送。

当时我们这些女兵们都把头发盘在帽子里，没有帽子的就用毛巾裹着头，扮成男兵的模样，一有情况，就端起手中的伞“虚张声势”——但土匪的威胁是实打实的。

纵有风风雨雨，却义无反顾，不改初衷。路途艰辛，我们苦中作乐，一路洒下歌声和欢笑。

和首长说方言，闹了大笑话

1952年5月到达新疆迪化（今乌鲁木齐）时，我开始非常失落：这里给我的感觉不像一个城市，比长沙差远了，道路不平，电灯不明，下雨一路泥，天晴一路土，刮风漫天沙。

在1952年入疆的湖南女兵中，我进入八一农学院学习农业生产技术，被分在中专班，主要学习植棉栽培技术和粮食作物的管理、保护。

有一天，听说学校有领导要来视察，因人手不够，我报名去当帮厨。食堂用来焖米饭的锅很大，一锅饭足够50人吃。由于第一次负责大锅，我把米饭烧糊了。

我蛮不好意思地把饭盛上，低头小声地说：“首长，不好意思，今天的饭烧糊了。”

“没关系，我就爱吃锅巴！”一声爽朗的回答，让我稍微放宽了一点心。我抬头一看，眼前这位领导穿得很一般，一身破旧的棉衣已经洗得发白。这位首长到底是谁呢？

“老乡来，你坐下。我是湖南人，听你的口音也是湖南人。”我一听到是老乡，立即回答：“对，我是湖南长沙人。您是？”“我

是湖南浏阳人。”首长笑着问，“你来新疆，高兴不高兴？”“高兴！”我迫不及待地说。“习惯不习惯？”“我们在学校里上课，什么都挺好的！”我说。

“那你们还缺什么吗？”
我想起从参军到现在，一直穿着一双不合脚的皮鞋，便说：“我还缺双鞋子。”在长沙话里，“鞋”与“孩”同音。首长笑着说：“缺孩子没关系，以后你到了工作岗位，结了婚就有孩子了！”

一听这，我害羞得面红耳赤，恨不得打个地洞钻进去，立马说道：“我还是干活去。”

这一幕引得围观的人哈哈大笑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原来，这位穿得破旧的首长就是时任新疆军区司令员王震将军！

“棉花姑娘”遇到了狼

那个时候对我们这些湘女来说，在新疆的唯一信念就是：改变当前的艰苦环境与生活。住地窝子、喝苦咸水、吃玉米面，没有新衣、没有妆盒、没有下班后的休闲，我与男同志一同挖水渠、扛麻袋、栽种棉花、开展劳动竞赛，也与男同志一同进行扛枪训练。

一手拿枪、一手拿锹，这是屯垦戍边的军垦战士战斗天地生活的全部。

经过在八一农学院两年的学习，我和同来的两百多名姐妹成为荒原上的第一代农技师。我被分配到121团当农业技术员。那时候，我们把国家的事看得大大的，专挑最艰苦的地方去，于是我选择了距离团部15公里的一个偏僻连队。

因为掌握植棉栽培技术，我被大家称为“棉花姑娘”。但是，和棉花打交道并不意味着没有危险。一次，我在团部机关开会，吃完晚饭已是晚上9点多。当时是8月，棉铃虫害暴发，为了赶回连队治虫，我摸着黑走路回去。这时，情况发生了一——远远地，我看到两点绿光，原来是狼！我站在那里，双腿像是灌了铅迈不动步。

紧要关头，我见一个老乡提着马灯走来，他是来给棉花地浇水的。我大喊“救命啊”，老乡发现了我，狼被马灯吓跑了。

那年夏夜，窗外的歌声打动了我

岁月无声，男兵女兵在新

疆相识、相知，来自五湖四海的我们这些女兵先后安家兵团，我的爱情也在这个时候来到了我的身边。

那年夏日里，在七连做技术指导的我，晚上住在湖南老乡熊大姐家，半夜里窗外传来了歌声“罗霄山山外的路段有座雄伟的高山……”悠扬的歌声驱走了戈壁的燥热，消散了白日的劳累，也悄悄打动了我的心。

冬天里，我到团部学习，此时唱歌人已调到团部当文化教员。我决定去看一看那个有着浑厚嗓音的男人是个什么样子。

晚饭后，我发现文教办公室里只有一个人，就走了进去。“你叫刘玲玲？”“是啊，听说你就是那个晚上唱歌的？”简单的话语拉近了两个人的心，我们相见恨晚。这个唱歌的男人叫贺荣洲。其实，当时我们聊了半个小时，因为害羞再加上光线暗，我没有看清他长什么样。

1956年3月的一天，我突然接到贺荣洲的电话：“我们结婚吧！”我一听忙摇摇头：“不行，我还小。”可贺荣洲的口气似乎不容商量：“我已经打过报告了，团里也批了。”

挂了电话，贺荣洲马上打通我所在连队连长的电话：“今天是3月7日，明天我们到沙湾登记结婚，请把刘玲玲送过来。”3月8日，一副爬犁把我们送到了沙湾县。在进民政局办公室前，贺荣洲叮嘱我：“工作人员问你愿不愿意和我结婚，你可要说‘愿意’啊。”我点点头说：“好。”我们交了5角钱的工本费，就领了结婚证。

和我们一样，许多爱情之花在戈壁滩绽放。因为处在特殊的历史时期，我们这些进疆湘女的婚姻不能完全以今天的爱情、婚姻观念来衡量。

后来有一个统计，我们的老



刘玲玲和丈夫合影。

伴有近40%是和我们一起进疆的知识分子，50%以上是当时的团以上领导干部。跟我一起工作生活的几十位湘女中，大多数人一生夫唱妇随，事业有成。

从兵团转业后的我，干过民政、计划生育、教师等工作，行行都要争第一。我先后获得过兵团先进工作者、自治区先进工作者称号。谁让我是个湘妹子嘞！



刘玲玲。

记者手记

她把积蓄作为特殊党费上交

记者初次见到八千湘女代表刘玲玲，是在新疆石河子市她的家中。她是八千湘女中的热心人，那一次，她叫来了很多湘女姐妹在她家中接受我们的采访，而她在一旁默默为我们服务。

2021年是建党100周年，刘玲玲将自己的12000元积蓄作为特殊党费，悉数交给了所在的街道社区党支部。她说：“我已年过八十，还能亲眼见证建党100周年国家繁荣富强、人民幸福安康的盛景，是何等幸运。如今，我愿将我的积蓄作为党费向党和国家献礼。”

如今的刘玲玲，仍然活跃在社区服务岗位。她说，今年换届，她本来想好好休息一下，但社区居民还是很信任她这位湘女老大姐，又把她选了上来担任组织委员。“那没办法，还是得干哪，不能辜负大家的信任啊。”

前阵子，刘玲玲出门时摔了一跤，腿骨折了，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后，她待不住了，跟儿子说社区的事儿多，要回去。儿子拗不过，只得把她接回了家。为了照顾行动不便的刘玲玲，社区班子还特意把会议放在了她家里开。“作为八千湘女的一员，我要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活力，以一个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，为人民服务到最后一刻。”